

东方文化丛书

日本中国学史

著者 / 严绍汤

东方文化丛书

日本中国学史

第一卷

著者 / 严绍溥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日本中国学史
作 者：严绍瑛 著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发 行：
经 销：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新华九江印刷总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20.625
字 数：459千
版 次：1991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1993年9月第2次印刷
印 数：1001—3000
定 价：20.00元
ISBN7—210—00896—9/G·25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331044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现时，我们不能否认，流行今天世界的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产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仍需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以发展和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文化。

欧美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比如英国的汤因比，从研究全部人类历史中发现，一种文化或者文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衰退的过程。他们把过去的人类文化或者文明，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个体。有的个体，比如美洲的玛雅文化，今天已经荡若云烟，不再存在了。有的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发展得如日中天。

一种文化或者文明，怎样才能继续发展，继续前进，继续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活力呢？关键除了内因以外，外因也起重要的作用，外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交流。哪一种文化或者文明，如果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就自我欣赏，自我感觉良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这表示，它已经失掉了生命的活力，注定要衰微或者消亡了。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

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五花八门、纷然杂呈的众多的文化或文明中，显然有文化圈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积之既久，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圈。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

这样四大文化圈，又约略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文化体系，指的是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闪族、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文化体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两大文化体系表现出来的情况仍然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在最大的宏观的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而且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哪一个文化体系也不是自一开始就占据着或者永远占据着关键地位、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垄断地位。

在今天的世界上，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体系。我们东方国家——在这里，“东方”既有地理含义，也有政治含义，即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也包含在内，近几百年以来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到了

今天，世界上西方以外的哪一个国家不向西方学习？哪一个国家没有受西方文化影响？专就中国而论，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文学艺术，甚至我们的风俗习惯和我们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了西方的印记。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向西方学习，则无法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无法推动社会前进。这个学习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不但今天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决不能稍稍放松。

但是，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的头脑也必须清醒，我们的眼光也必须放远。我们必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来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最近几百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只代表最近几百年的发展。前于此者，情况有所不同，后于此者，情况也将会有所不同。只有放眼观宇宙，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地预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

我们这一套《东方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想给读者以有关东方文化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全国人民关心文化问题，是合乎规律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这几个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答案。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化问题其中也包括东方文化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目迷五色，花团锦簇。我们想在这一面锦上再添上几朵鲜花，共庆升平。对目前注意东方文化很不够的情况，我们想加以矫正或者平衡。因为

是丛书，作者很多，探讨的方面也很多，观点就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编委会对此概不干预。每个人的观点由作者自己负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章达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材料又翔实可靠，我们就收入丛书中。我们希望真正能做到百家争鸣，而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行动方针。

季羨林
周一良
庞 朴

我和日本中国学

严绍璁

这些年来，常常有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和青年学子，**这**恳切地与我研讨“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中诸事。我为他们对于学术的真挚所深深感动，却也常常为此而陷入困惑之中。

多年来，我的心头积存有一个宿愿——中华民族的文化弘扬于世界，当以传入日本时间为最早，规模为最大，反响为最巨。对于这样辉煌的文化现象，中国学者理应依据自己民族的文化教养，作出属于中国学者自身认识的主体性判断。在我的老师季羨林教授、周一良教授、阴法鲁教授诸先生的督导之下，我开始撰写《日本中国学史》，作为建设这项浩大工程的尝试。现在，第一卷甫告完工，江西人民出版社即将付梓以贡献于社会。我的这个宿愿，方始得以慰藉。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可以推测到远古的史前时代。如果把书面文献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那么，古代中国文献典籍肇始东传，至今也已经有1600余年的历史了。其传播的规模，在世界文化史上蔚为壮观（参考第一卷第一章）。以这种文化传布作为基本背景，在日本思想文化领域内，逐步发生了以中国文化为专门研究对

象的独特的学术。这一学术，在古代日本被称之为“汉学”，在近代日本被称之为“中国学”（战前被称之为“支那学”）。这正是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所表现出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虽然都是以中国文化东传日本作为基本的背景，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范畴。

“日本汉学”不仅表现为日本人从学术上试图研究中国文化，而且更表现为研究者在立场上具有把研究对象充作自我意识形态抑或社会意识形态——即作为哲学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的强烈趋向。“日本汉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它在日本古代社会的最后300年间，臻于成熟。德川幕府政权把“汉学”中的朱子学派推尊为官方哲学，斯为“汉学”最高的也是最后的“荣光”。

“日本中国学”与“汉学”的性质不尽相同，它是在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识的近代化潮流中形成的一种“国别文化研究”。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摆脱了传统的“经学主义”文化观念，而以“近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其学术的导向。一般说来，日本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内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涉及下列四个方面：

- ①中国文化向日本及世界传播的轨迹和方式（其中包括了日本与各国对中国文献典籍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 ②日本与世界各国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本民族文化在内在层次上所产生的诸种变异（其中包括文化的形态与内容的分解、复合等）；
- ③日本与世界各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国观”，特别是“中国文化观”的内容、特点及其变迁；
- ④对中国文化诸领域各类学术具体内容的研究（其中包括在研究中形成的各种学

术流派及其方法论)。“日本中国学”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诸如中国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等,它们当然是属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范畴。但是,就其研究者的主体观念和方法论而言,则无疑是以日本文化素养为背景而形成的,研究者所阐发的关于对上述客体对象的一系列观点,从本质上讲,都是日本文化观念在一个特殊领域里的表现。因此,这一学术研究,便自然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日本中国学”是一门涉及双边文化(其中也包含多边文化)的近代边缘性学科。

“日本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其间经历了十分复杂而又坎坷的过程。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随同日本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确立了统治地位,它们在思想精神领域中,也创造了不同于封建性质的反映本阶级意志的近代性文化。“日本中国学”作为其总体文化的一个侧面由此而形成,“日本汉学”亦由此而衰微。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作为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两大历史时代而互相联接在一起。我们这里说的“否定”,是指在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它与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关于文化运动的客观规律相一致。“日本中国学”在形成之初,大多数学者所具有的创造性精神,使这一领域获得了许多堪称杰出的成果。我国近代学术文化运动中的许多先辈,如鲁迅、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茅盾,乃至梁启雄、孙楷第诸先生,都曾十分注目于这一时代“日本中国学”的业绩,并使之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研究之中。但是,“日本中国学”本身亦患有先天不良之症。即使在这一学术蓬勃发起的时代里,它内含的若干日本国家主义的因子就已经异常活跃了,在本世纪20年代之后便得到了恶性发展。更由于当时占统

治地位的日本军国主义把“大陆政策”演化为实际行动，“日本中国学”终于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一种工具——尽管许多有良心和良知的学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这一学术的总体“转向”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日本中国学”的这种严重挫折，使近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仅蒙上了深深的阴影，而且使其早先表现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这是日本自资本主义化以来，天皇制政体一直迫使学术研究屈从于自己狭隘利益的必然结果。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宣告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近代中国观念的破产。战前的“日本中国学”，曾经以空前的规模，展开了对中国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对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对于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乃至对于中国当代革命政党和革命运动，都未曾作出正确的结论。因而，战争的失败，事实上也就宣告了旧“中国学”的终结。当旧“中国学”崩溃的时候，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国研究者，以及在战争中保持着学术良知的中国学家，开始了重建战后“日本中国学”的努力。经历了大约10年的“反省”时期和10年的“恢复”时期，从本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日本中国学”终于获得了新的发展——它造就了一支近代型的教养有素的研究家队伍，建设起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机构，构筑了在日本中国学学说史上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体系。同时，它也成为推动日中友好的一支积极的力量。近20余年来，“日本中国学”界虽曾几经风波，而且“大和魂”的国粹主义也时有所现，但就其总体而言，它无疑是国际中国学界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代表。无论是就中国文化的研究而言，还是就日本文化的研究而言，抑或

是就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而言，“日本中国学”皆是不能忽视的领域。

我对日本“汉学”和“中国学”的最早兴趣，初起于60年代之初——当时，“日本中国学”正从“恢复”时期迈向“发展”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1959届的学生，开始接受仅有三个人参加的日文训练。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我们专业的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魏建功教授。魏先生学识高卓，举世知名，慈祥和蔼，如我父辈。他令我们3人在半年内修完大学2年的英文，即开始攻读日文。魏先生对我们说：“一定要去翻动那些日本人的著作，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研究，不要被他们笑话了我们。”魏先生的这一决断，虽然令我们一时为难，但我们毕竟是听话的学生。于是，便师从陈信德先生和魏敷训先生，开始了日文的入门训练。待我们稍稍懂事又懂行后，才体味到魏建功先生的看法在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在人品上的高尚情操——他对学术的严肃和内含的爱国精神，作为他的学生，是一生受用的。

当时，我只是一个幼稚的大学生，试着涉足日本“汉学”和“中国学”领域。稍一接触，便茫然起来。我喜欢中国的历史，开始便想研究“日人的中国历史观”。满以为识得了假名，便有了依托。在北大的图书馆里，稍稍翻动日人的著作，面对像那珂通世、桑原鹭藏、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等历史学家，不知从何做起。慢慢地终于悟出了一点道理，因为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一领域的基本资料，全然不明白这些研究的文化背景，一点也没有日本“汉学”和“中国学”的发展史概念。例如，中国史学文化是如何传入日本的？日本人是在什么样的哲学观念下研究中国史的？日本传统的史学

观念与近代的史学观念其内涵与异同是什么？日本有哪些主要的中国历史研究家？他们各自有些什么代表性的著作？这些学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师承关系，又可以归结为什么样的学派？日本中国史的研究对文学、哲学、艺术的研究又有什么影响？这些接踵而来的问题，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回答得清楚。由此我想仅凭兴趣和热情，又如何能敲开这座学术的大门呢？于是，我决心认真研读日本“汉学”和“中国学”的基本资料和发展史，奠定今后从事这一学术研究的基础。然而，当时在国内，这二者都是空白一片（后来才知道，日本学界也是如此）。于是，我又茫然起来了。

1974年秋冬，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全国工作期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我和6位同行一起，到达了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发源地之一的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到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实态，有机会在从仙台到冲绳群岛的日本各大学中，与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林屋辰三郎、小川环树、岛田虔次、福永光司、宫崎市定、井上清、实藤惠秀、安藤彦太郎、前野直彬、伊藤漱平、藤堂明保、松枝茂夫、增田涉、金谷治、伊藤正文、伊藤道治、竹内实等近二百位中国学家相识，仔细地听取了他们关于日本中国研究的许多见解。其中，如岸阳子、小野信尔、小野和子、狭间直树、吉田富夫、小南一郎、中岛长文、中岛碧、山田敬三、坂井东洋男、萩野修二、森时彦等与我前后同辈的先生，更给我以许多切实的帮助。回国后在经历了光明与黑暗的一场决斗之后，国家迎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学术研究也开始了真正的春天。

15年来，我在日本“汉学”和“中国学”的学术方面，着手于两件工作。一是始终坚持从基础性资料的搜

集和整理编纂做起，二是努力于学术史和学科理论的建设，这二者又是密切相关联的。

现在有些青年研究者不大愿意从事基本资料工作，觉得这种工作不是学术。其实，这正是学术研究的最基本的环节。在日本汉学和中国学领域里，没有现存的资料可以依靠，必须自己动手。我于70年代末花了近4年的时间，编撰出版了《日本的中国学家》，作为“日本中国学”基础性资料的第一部工具书，它收录的是1000位日本中国学家，为此而摸触的材料，则有几千种。这部工具书有错误缺漏，需要补订。但我本人通过这一方面资料的整理，对日本中国学家的全状，基本全局在胸了。80年代中期以来，我又开始编撰《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至今搜集到的自古传入日本的中国文献典籍善本七千余种。文献典籍是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主要载体。掌握了这些典籍的来龙去脉，基本上也就弄清楚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主要方式与特点。最近几年，我又和几位朋友合作，编译《1900—1990年日本中国学论著目录》，分文学、历史、哲学与宗教三卷。这个“目录”当然不可能一篇不漏，但是，编译这3卷资料，我们便掌握了日本中国学在这三大领域内20世纪发展的总趋势。我在日本汉学和中国学领域内，从基本资料的搜集整理中，形成了理论性的思考，例如关于本书的基本构想以及我关于日本文化的“变异体”理论，“在排异中实现变异”的轨迹模式等等，都是从10余年来大量基础性资料的整理中引发出来，并加以升华抽象的。一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工作者，如果一生都未曾做过基本的社会调查和学术资料的搜集整理。那么，我以为这种学术便是大可怀疑的了。在日本中国学和其他国际中国学领域内，基本资料建设的工作量，恐怕要超过人文科学的其

他学科，因为自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内，几乎没有积累过任何系统性的资料，需要今天的研究者，脚踏实地去做好。

在日本中国学的研究中，有时常常会使自己面临窘境。只要一旦脱离了“中国学”研究的总环境，不是从发展史的立场上来评定其价值和意义，常常会失于偏颇。这几年间，学术界偶有把一个日本学者的见解，衍化为日本学者的一般性见解的极端事例，使国际中国学界为之愕目。此种现象的存在和继发，告诉我们系统地研究“日本中国学学说史”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了。当然，于我个人来说，先师魏建功先生在60年代初告诫说的“一定要去翻动那些日本人的著作……不要被他们笑话了我们”的教导，一直萦绕心头。我从80年代初期起，致力于学术史的研究。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需要有充裕的基础资料和足够的理论素养，这二者于我皆缺，我只是努力而已。日本中国学史的研究，涉及双边文化的关系。因为日本人表现出的中国观念，特别是中国文化观念，实际上与在不同的时期里中日文化接触的内容与形式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动手全面进入学术史研究之前，先做了点“比较文化”研究——我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研究了中日文化接触的诸形式，撰写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已出版）。在此基础上，我开始了多卷本的《日本中国学史》的研究写作。现在，第一卷已经呈现于读者。

我历来主张，从事于双边文化研究的人，必须自己动手做翻译，把非汉文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自己翻译过来。靠别人翻译，不免有局限性，做不得深入的研究。但是，自己动手翻译的目的还不在于此，更要紧的是通过阅读原著，并亲手处理不同语言文字表达上的

异同，获得特定对象国的文化感受，只有具有这种文化感受，才能体味和把握他们的逻辑、思维习惯乃至情感。依据日本中国学中实证主义学派的要求，从事中国学术研究的人，不仅要求文献的实证，而且要求从事文献研究的人的经验实证。我们限于实际条件，不能要求研究者都在特定的对象国获得文化经验的实证，因而，通过语言文字加以感受，便越发必要了。我每年总要做点这方面的笔耕，刊出了超过50万字的译稿。这一学科的研究生也必须做翻译。作为“日本中国学史”的一个配伍，目前正在筹措编译《日本中国学名著译丛》。

在数年的研究撰写之中，我曾于1985年度应日本京都大学的邀请，担任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学”首任客座教授。1988年夏季应香港树仁学院邀请，担任人文学部客座教授。1989年秋至1990年春应日本佛教大学邀请，担任文学部客座教授。在数次“客座”期间，我曾有机会以“日本中国学史”为中心的诸项研究，与诸位先生切磋研讨，查核资料。有了这样的机会，本书才得以最后定稿，这是我要感谢于他们的。

我真诚地感谢在研究过程中给予我教诲和帮助的老师和朋友。记得70年代初，我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老系主任杨晦教授虽然自己曾一再被批斗，但他仍然多次嘱咐我说：“你那个日文不能丢啊！日本汉学还没有什么人搞，这是很要紧的，将来还是会有机会的。你还要抓住英文和法文啊，多念点马、恩的书，看原著最好啊！”杨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的前辈，以他对学术的忠实和对未来的希望，教诲于他的学生，我一直铭记于心。在我开始编撰《日本的中国学家》时，需要两万张卡片，那时我一月工资56元，只能用各色杂纸拼替。当时，刚刚重返领导岗位的副教务长

向景洁先生，从他所能掌管的有限的财政中，一次批我300元，一次又批我500元，而且表示不要偿还。我是怎样的惊喜不止，这是比我一年工资还多的钱！我从内心感到组织上对学术的支持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啊。1985年国家教委古委会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正式列入其重点项目之中，秘书长安平秋教授并建议我将《日本中国学史》全部提纲摄制成33小时的录像片，提供给相关的研究所参考，给我以重大支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专门设立了“国外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室”，所长孙钦善教授为此创造了诸多条件。1985年夏，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又批准招收我国第一个“日本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科建设。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对本书稿的写作给予了支持和帮助。陆晓燕先生在日本、香港等为本书稿搜集和译出了诸多资料，并对稿本中的若干章节提出过许多诤难，使作者加以辨正，避免了不少在论证方面和逻辑方面的失误。刘萍女士也曾就若干观点与著者进行过深入的磋商。

出版社睿智的眼光和真诚的合作，使我个人的努力能够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当本书稿还在写作时，季羨林教授和周一良教授决定把它收入《东方文化丛书》之中，江西人民出版社即以满腔热情，慨然允诺将这有100余万字的多卷本《日本中国学史》付梓，不向作者索要分文补贴。责编唐建福先生，诚恳热情，负责谦恭，曾数度赴京，与我研讨书稿诸事。当本书第一卷于今年4月24日下午2时最后定稿时，唐先生于5时把书稿取走，翌日即行返赣。此种忠于学术，勤于责守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

当本书第一卷呈现于读者之前时，我忆起日本当代中国学泰斗吉川幸次郎先生1975年3月曾对我说，他准